

1901
第四十九辑

廣州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廣州文史

第四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編

主 編 羅 進

副主編 彭頌濤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启和

广州文史

第四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军区司令部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58,000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18-02077-1/K·462

定价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革命风云 •

- 我的革命经历 刘士杰(1)
我在岭南大学参加地下活动的经过 黄淑暖(18)
梅州籍华侨与辛亥革命 李存章(26)

• 同舟共济 •

- 方方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 罗培元(32)
抗战中后期民盟在清远、佛冈的活动点滴
..... 梅日新等(45)
我的父亲李伯球 李锐 李刚(50)

• 抗日烽火 •

- 宣传抗日救亡的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 梅日新(91)
回忆在东纵的日子 黄淑暖(98)
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清远城 梁伟针(108)
对《美国飞行员坠落棠下脱险记》的补充
..... 岑观 谭铁栋(111)

• 两岸情深 •

热心促进两岸关系的徐亨先生 何炳材(114)

• 人物春秋 •

李福林自述 莫纪彭笔录 李业宏整理补充(124)

北伐军医黄世德 黄成业等(166)

在抗日学运中捐躯的冯道先 黄穗生(170)

• 羊城旧事 •

海珠桥修复记 卓观培(175)

略谈解放前广州的方便医院 陈醒吾(185)

• 香江一瞥 •

香港沦陷杂记 冯维标(189)

香港的庙宇 邓又同(196)

●刘士杰

我的革命经历

1908年，我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皇踩畈村。父亲在小学教书，母亲做家务，三个哥哥务农。自己只有一亩田，其余租地主的田，粮食不够吃，生活贫苦。我8岁时开始随父亲在外村读书，读的是古籍书，教师没有详尽的讲解则不易懂，仅起识字的作用。我小时字就写得好，到了读高小、中学时就喜欢图画、手工。1923年插班进大冶凉亭高小读书，学的是新学，如数学、英语、自然、历史、地理等，也有古籍书，如《左传》、《古文观止》等，这时才开始接受新的知识。学校曾进行一次反对袁世凯卖国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的教育，并在农村宣传抵制日货。这些活动给我上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课。我村靠龙角山铜矿区约七八里远，日本侵略者修了一条轻便铁路至下陆，掠夺龙角山的铜矿资源运往日本。在开矿和运输中经常鞭打开矿工人，剥削压迫搬运矿石的农民，工人农民不如牛马。每年秋季，压价收买苧麻，高价推销洋货。这使我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一、大革命时期

我是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9年9

月转党的。1926年在大冶中学读一年级，北伐军11月攻打武昌城，打垮了直系军阀吴佩孚，震动了全国。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期间，大冶县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由县城向农村扩展。就在这时我参加大冶中学革命运动。当时设立了大冶县党组织，书记是李襄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学生运动搞得非常热烈。县城里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妇女群众都发动起来，工人组织了工会，妇女成立了妇女协会，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生的革命活动特别活跃，校长姜彪、教务主任明哲是共产党员，还有两个学生也参加了共产党。我在学校中也是一名积极分子，担任童子团队长。在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发动下，由中学生领头，店员、手工业工人、妇女群众（妇女协会）及部分市民浩浩荡荡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冲进北洋军阀大冶县政府里去，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我们童子团冲进县官卧室，把县知事高建镛捉到大冶中学关了一天一夜。审问他欺压人民的罪行，他承认罪恶，说以后不当县官了。在革命的斗争中我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开始懂得救中国和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道理，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县党组织发了一张表给大家填，有一栏问：“你赞成民生主义还是赞成共产主义？”我填赞成共产主义。当时的思想是：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二是农村社会贫困，我的家庭也是贫穷的，豪绅地主欺压、剥削劳动人民很厉害，希望变革社会。就在这年冬受到大冶地区共产党员石子祥、刘先元（刘是留学日本参加共产党的，石是1926年参加共产党的）引导，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开始是作宣传工作，如演话剧（当时叫“文明戏”），在四、五两区开展工作。那时未有剧本，自编剧目，自当演员。一个剧名是《打倒帝国主义》，描述日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第二个剧名是《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内容针

对土豪劣绅刘仲甫压迫、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群众看了非常高兴。为铲除压迫剥削，只有团结起来干革命。首场话剧是在马对于表演的，看的群众很多，不断地热烈鼓掌，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土豪劣绅吓得胆战心惊，群众笑逐颜开。接着到五区殷祖、刘仁八、卫祥港等地去演出。唤起了农村工农群众对革命的热情，提高了觉悟。

1927年1月间，刘先元、石子祥倡议乘刘氏宗祠（设在皇踩畈）祭祖的机会斗争劣绅刘仲甫。这次斗争事先作了组织布置，刘仲甫必须出场。刘姓的各个村庄都有许多群众参加，当场宣布刘仲甫的罪恶。刘先元、石子祥和我们一些积极分子都坐在戏台上。布置刘茂德（他的家庭贫穷，曾在吴佩孚军队里当过兵，很勇敢）在台下抓住刘仲甫。当宣布刘仲甫的罪恶时，群情激愤，热烈鼓掌。他亲房的一些人把他拉走了，他过去那种恶霸的气焰一扫而光。

1927年3月间，我考入湖北省立第六中学，校址在黄州，即今黄冈县。这个中学是新设立的男女生合校，将原懿师范女子中学合编到第六中学。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女分开设校的传统，在湖北还是首次。湖北省立第六中学校长梅一略和教务主任等是共产党员，所以革命气氛很浓。我们进一步受到革命的教育。学校发给我《共产主义ABC》、《劳工神圣》、《共青团歌曲》等书阅读。纪念“五卅”运动二周年时，学校组织几个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我参加到黄冈农村宣传一队。队长是共产党员，他看到我宣传得好，就让我当副队长。宣传的内容大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其屠杀工人顾正红的罪行；只有团结起来打倒那些吃人的毒蛇猛兽——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人农民才能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进步的社会。当时革命声势很大，土豪劣绅、军阀、贪官污吏大肆攻击第六中

学，扬言要进攻第六中学。“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势日趋恶化，夏斗寅叛变革命被叶挺军队打垮后窜到大冶黄石港、石灰窖。为了避免敌人的屠杀，6月上旬，校长、教员、学生都走了，我们大冶县的同学南渡长江，经鄂城回大冶。到鄂城后天气突然变化，一时狂风暴雨，兼之我们乘坐的帆船掌舵和扯帆的均很紧张，两人争吵起来，我们担心把船闹翻了。我头晕得厉害，呕吐不止，船夫说不能走了，把船靠在南岸木排上，我们三四个同学登上木排，其他同学稍停一刻也走了。我把我的木书箱交给一个年轻的同学捎回去。木排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夏斗寅的部队到了黄石港，你们不要去了。你们到黄石港很危险。”我一听大吃一惊，因为我的书箱里有《共产主义 ABC》等三四本书，被夏斗寅的部队检查出来就没命了！我回家后，听由黄石港回来的同学说：反动军队检查出《共产主义 ABC》要杀掉给我带书的同学，他说这个箱子不是他的，并有其他同学证明，才没有再追究他。回忆起来好危险呀！如果不是天气变化突然狂风暴雨，我所坐的船无法一直开到黄石港的话，我可能已被夏斗寅反动军队杀害了，哪还有今天的我呢？解放后，我在武汉市委工作，任市委委员、武昌分委书记兼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武昌特派员。当时夏斗寅还住在武昌，我提出把他逮捕起来，因为他非常反动，大革命时他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不同意，才让他跑掉了。

从湖北第六中学回到大冶县后，我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大冶县的革命运动搞得非常活跃。在石子祥的带领下我们向大土豪罗巨舫筹款，一亩田 5 元银洋，这个土豪有 200 多亩田。他说出不起这么多，我们加价，每亩 10 元，这样一压，他不得不一亩出 5 元。县城里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将刘仲甫等捆在台柱上斗争，但没有将罪大恶极的处决几个，反而在后来

的土地革命时期被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刘仲甫在皇踩畈村一次就杀了5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底,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出布告通缉共产党员,因此,我们的活动形式和工作方法改变了,退到山上作根据地,进行秘密活动,组织群众和发展党员。1928年一二月间,党组织考虑我的身体不甚好,要我到阳新太子庙我大哥与人合伙开的布店暂时隐蔽,待形势好转后再派人接我回去。

二、土地革命时期

1929年五六月间党组织派我叔叔的大儿子刘祥轩接我回大冶工作,安排在大冶县苏维埃政府当秘书做油印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与罗玉轩两人干这个工作。当时我大伯的大儿子刘世范是大冶县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委员。县委的油印处驻扎在南山头上郑、下郑等地,负责人是胡涤尘、张秋明及其爱人。除负责印发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品和各种文件外,还有中央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重要文件。敌人进攻苏区环境紧张的时候,我们从北山头迁移到南山头。

1930年夏我调到中共鄂东南特区委,后改任道委组织部干事兼宣传干事。1931年转到油印处工作,工作人员共有五六人,主要负责人是陈善,他搞油印工作时间较长。后来说他是改组派而被捉去杀了,他的叔伯兄弟陈坚也被杀了,另一个叫刘迪华的因自首了没有被杀。这样就只有我和三四个搞印刷的及挑夫,领导就安排我当油印处处长。在这之前陈善造谣说我是改组派,刘海山(道委组织部长)骂了陈善一通,过一两天就把他捉去杀了。那时候乱得很,谁也不敢乱说话。原在大冶县委油印处负责工作的胡涤尘同志调到道委不久也突然失踪了,显然是被当作改组

派杀了。甚至连道委宣传部长吴干、秘书长张鹏九也当作是改组派而被杀了，副书记王庄全也被说是改组派，以他工人出身准他自首了。鄂东南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也当成改组派被杀了。总而言之，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乱杀改组派，把许多好干部杀了，除了书记吴致民（胡梓）等主要负责人外，我算是幸存的一个。我在特区委、道委工作时间长，很得人和，所以幸免了。为什么杀改组派这么厉害？让鄂东南政治保卫局长明福安一个人这么干而没人能制止住呢？因为仿效和搬用苏联的机构设置和肃反经验，政治保卫局是一个独立的垂直系统，不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由他去干，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仅大冶县就杀了 365 名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其他阳新、通山、咸宁、崇阳、武宁、修水、通城等县加起来就更多了，其中阳新、通山杀得最多。不要党的领导，而由机会主义、“左”倾分子去搞肃反，所以许多好党员好干部被杀了，真是可惜！经大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盛茂炯之手就杀了很多，如石子祥、刘世范、刘梅岭、罗玉轩、刘世模等同志。盛茂炯是雇农出身，当革命根据地缩小时，他叛变投敌了，做了不少坏事情，全国革命战争胜利后，把这个叛徒处决了。

鄂东南地区杀改组派的“左”的错误，一提起来真是令人痛心。我还活着，真是万幸，很不容易啊！鄂东南肃反“扩大化”，乱杀改组派的错误问题时间长，是怎样纠正过来的呢？这得力于省政治保卫局长曹衍安和吴致民同志。1934 年冬天曹衍安为了纠正这一错误特地来鄂东南检查杀改组派的问题，曹、吴与我三人在一个堂屋一边烤火，一边交谈过一次。曹到保卫局批评保卫局长明福安，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胡梓（吴致民）也是改组派。明福安是怎么看问题的呢？他曾问罗冠国（鲁连）是什么时候加入改组派的，罗答：“我不是改组派。我在南京东南大学经吴

致民介绍加入共产党的。”明福安就抓住这一点，说罗冠国是胡梓介绍加入改组派的。这是多么荒唐。曹衍安同志后来把明福安处决了，这样鄂东南杀改组派的错误就制止住了。今天看来，鄂东南道委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地纠正杀改组派的错误。

1931年到1935年，我一直在道委工作。中央、省委、道委的决议、指示、告群众书等重要文件和宣传品、实话报书籍等，都是我们用油印印刷装订出来的。那时搞油印工作虽然条件很差，但有一种强烈的为党负责的精神，不怕困难，从不叫苦，有时日夜干，屁股生疮仍然坚持干。方步舟在军队里给我弄到药医治才好些。后来找到其他同志接替我们的工作。1935年1月我担任道委秘书长，工作繁重，除起草道委的决定、指示文件和宣传品外，还要负责会议记录，管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当时最困难的是吃饭问题，经常没有饭吃，没有衣服和鞋子穿。同志们肚子饿得发慌，就去挖野菜充饥。有时群众磨了苕粉晒在瓦上，就取些渣子来和野菜一起煮了吃。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在山上不能生火，饿得发慌就吃生米，但吃几口就不能吃了。

1935年春节（过旧历年），道委驻扎在通山冷水坪。江西一营敌人乘拂晓之机，冒充我修铜宜丰边游击队，袭击鄂东南道委机关。我们损失很大。胡梓同志牺牲，我冲出敌人包围。中共道委、少共道委和政府以及工会、反帝大同盟、妇女团体绝大部分干部都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到三界尖集中。为了纪念胡梓同志，将修武崇通县改为胡梓县。县委书记刘赤英缺乏警惕也牺牲了。由于湘鄂赣苏区缩小，红军受到一些损失，省委决定将鄂东南道委改为中共湘鄂赣省委驻西北代表团。我仍任秘书长兼宣传委员。书记换了四位同志，最后一位是江渭清同志。代表团辖十几个县、一个中心县委、两个特委（即湖北特委、赣东北特委）。

1936年12月，为了加强开展湖北特委大幕山根据地的工

作,扭转特委经常遭到敌人袭击而受损失的局面,在特委书记宋运昌未到职的情况下,组织上调我去当宣传部长,暂代书记的工作。我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带几个干部和几个武装人员从九宫山北面出发,通过敌人几道碉堡封锁线。夜晚在经过通山县以西一个的小镇时,铺面掩着,可看见里面睡着敌人。我们过这条小街时,一个敌军士兵哼着调子由东面走过来时,在这紧急的时刻,我们领路的交通员问我怎么办,我说把他捉住。这个被抓的士兵吓得发抖,从身上拿出几颗子弹给我们。我说,我们是红军,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他惊惶地告诉我们:“你们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占领了西安,把蒋介石和几十个高级将领都捉起来了。”我们一听高兴极了。两天后,我们把这个俘虏兵释放了,走时还给了他五元银洋。我们当年在山上转圈,得不到报纸和消息,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实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大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红十六师和红三师正在大幕山一带消灭敌人,摧毁了几十个碉堡,我们一到就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镇压了一个保卫团团长,烧毁了一个碉堡,将没收反动派的东西分给群众。我们还根据当时情况,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摸清村庄的情况,镇压反动派,把群众组织起来。过去机关常遭到敌人的袭击而受损失,我与特委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贯彻执行省委代表团的指示,根据当时情况坚持按照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进行活动,勤于运动,百倍警惕,大大减少了损失。这样机关在山上就能扎根,巩固了大幕山这块根据地,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

我在特委工作不久,省委代表团又调我回去担任秘书长兼宣传委员(即宣传部长)。在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起了变化,工作更加紧张,如果对各县要发紧急指示,就得把文件连夜赶写出来,没有油灯,就点松枝照明。总之,三年游击战争,特别是最后

一年尤为艰苦，但革命的意志愈磨愈坚。

鄂东南道委从龙港撤退到九宫山脚下东坑、西坑以及退到九宫山这一段时间内，原道委和省委代表团机关遭到敌人几次大包围袭击和尾追，我们都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摆脱敌人的尾追。如东坑、高枧、冷水坪、高湖山上等地战斗就是这样打出来的。下面我讲讲当时的战斗过程：

大约 1933 年的夏天，鄂东南道委机关和群众团体驻扎在东坑，敌军约一二个团的兵力向我们进攻。道委主要机关干部住在西边村子里，我带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东边村子里。敌军是从东边的山路进攻上山的，道委等机关向西边很快撤走了。我们一二十个人不能向西撤退了，只好就地在山林里隐蔽。我们早上饭也未吃就一直坐到天黑。敌人在山上嚎叫了一天，没有找到一个人。群众在山上躲白匪也是很有经验的，敌人假装这里捉到一个，那里捉到一个，想骗群众出来，怎么嚎叫也找不到一个人。天黑了，敌人还未走怎么办？看样子明天敌人还要搜一天山。我与道委机关的干部商量怎么冲出去，大家要我作决定。我说：今晚一定要突围出去，明天不能再藏在这里了。如何突出去呢？最后我们决定向东边的原始森林突围，那里敌人不敢去的，这是我们突出去的最好空隙。原始森林里很不好走的，就靠两手攀上去。大约十来里路，攀了一晚上，我们手、脸、脚及身上其他地方都被刺划破了。到天亮才翻出山头，我已精疲力尽走不动了，其他同志扶着我走到一个沟里掩蔽起来。幸好沟里有一条泉水，可以解解渴。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派一同志去了解情况，群众说，敌人已退走了。我们十几个同志就走大路下山，到一村庄吃饭。我说，两天没有吃了，好好吃一顿，但不要吃得太过饱了，吃得过饱会胀坏的。吃饭后立即向西坑去与道委机关汇合，道委领导同志很高

兴，称赞我们这次突围的办法好。

高视突围。大约 1934 年的夏天，红十六师和红三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军一团兵力，缴获许多武器。过了几天敌人突然向我们进攻，道委机关和军分区一时走不开，就转移到后面大山上。敌人包围高视大山，还是使用老一套，四面嚎叫。我们早上未吃饭，快到中午时我与军分区参谋长商量伺机突围，不然被敌人发现损失就大了。我们两人确定道委机关和军分区一道突围，冲下山去，冲出敌人的包围。到大路上跑步时，敌人在山顶上打枪嚎叫，只是对我们毫无办法。我们经过一个小山，登上山去休息，既跑累了，在炎热的夏天中，又饥又渴。休息一会就转移到通山冷水坪。

1935 年，一次道委机关和军分区一道行动，在通山高湖南面大山上的一个小村子休息。我们估计，村里的反动派下山去告诉敌人大约需要一小时，赶快做饭吃了就走。我们的饭还未做好，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敌人就来了。军分区参谋长带着部队走了，未通知我们。我还是很警惕的，我出门一看敌人已经到了村庄的下面了。我断然决定，不能跟军分区后面走了，便带同志们迅速向左边上山转移。敌人追军分区的部队去了，没有向我们这边上山来。正在这时候，天气突然变化，雨雾濛濛。敌人看不到我们这一路，天助我也。我们安全地摆脱了敌人的袭击，走到另一个山坳上在大雨淋漓中蹲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与军分区汇合，还未来得及做饭吃，敌人又来了。我们与军分区一起翻过一个小山下到一个小冲，敌人一直追到下午。我们登上胡梓县管辖的山上，穿过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到一个小村庄休息。派司务长到十几里外的地方买粮，天快亮时才回来，吃完饭天已亮了。敌人又追了上来，我们立即撤退。当时无法择路，就向一人多高的莽草林滑下去。过一个水沟，登上另一个山，我提出意见，不要走

路，走水沟上到半山腰，在一小村里休息一会儿立即就走。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踪。

夜过老鸦尖。老鸦尖是九宫山最高的山顶，海拔1657公尺。南北是很陡峭的悬崖，没有路，只有几个像马鞍蹬样的踏蹬。敌人从东面向苏区进攻，我们就到西面，攀藤而过，稍一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的悬崖底下。道委书记吴致民和方步舟就从这个悬崖抬伤兵过老鸦尖。一般农民不敢抬，看到胡梓能抬过去，就壮着胆子也抬过去。

在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集中兵力向鄂东南苏区根据地进攻，道委机关不能在这地区活动了，就计划到湘鄂边地区去活动。白天隐蔽，夜晚活动。道委机关一二十个人，其中女同志五六个。到湘鄂边经过一条河，从浅的地方过去容易被敌人发现，且有的女同志是解放脚不便过水，从深的地方过去又不会游泳，在紧急情况下想不出好办法。我提出找群众带路，一刻也不能拖延了！我派两个同志去找群众，找来两个农民群众带我们走浅水的河段，男同志拉着女同志的手，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湘鄂边，环境稍好点，吃的也好点。住了几天，敌人又进攻了。我们隐蔽在森林里，敌人在山下嚎叫。我告知道委的同志，不管敌人玩什么花样，也不要行动；即使敌人发现一个同志，也不能乱动乱跑，只说是做农活的。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任何时候都要有高度警惕性，不能有任何麻痹，稍一不慎，或者拖拉一下，就会犯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胡梓县的县委书记刘赤英，就是机关驻扎一地不动，没有经常的灵活的转移运动，没有派人经常侦察敌情，遭到敌人袭击而牺牲的。大幕山特委机关受损失也是如此。大约1933年的夏天，我们到高湖地区去打土豪，夜间打了土豪回到驻地，在南山上住了两天，第三天本应当提前出发，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催促

了几次，带部队的负责人就是不听我的意见，说不要紧，到中午再走。幸好我们没有停止侦探，早饭后敌人来了，我们的哨兵打枪，急急忙忙的向右边山上跑。我们押着三个土豪转移，我押一个女的，她走不动，敌人一枪把我右手衣袖口、裤子（正靠大腿部位）、挎包都打破了。当时手一甩，我以为这回给打伤了，结果皮都没有伤一点，真是万幸。

1936年的夏天，敌军一个排向我们投诚，我们机关部分工作人员驻扎在百步梯的山上，欢迎他们来投诚红军。这个排备有全副好的枪支，我们有的同志怀疑是否真的，不敢接受。我认为不会是假的，是形势发展使他们觉悟了。我与这个排长谈话，问他为什么投诚红军。他说国民党军队里官兵不平等，吃穿悬殊，不抗日，专打内战。还说红军好，官兵平等，爱国家，主张抗日，所以我们决心投到红军里来。我们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编入我们部队，后来部队的同志告诉我，这个排的战士表现很好，打仗勇敢，遵守红军的纪律。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国内形势好转，我们游击战争的形势也好了。1937年春夏末夏初的时候，省委驻西北代表团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是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江渭清同志带着主力部队向通城方向行动，另一路是由副书记余再利同志和我负责到湖南临湘县活动。正当春风和煦，田野小麦正黄的时候，我们行进到临湘县境内，受到临湘中学的学生夹道欢迎。学生们的抗日热情非常高，一方面向我们汇报当地国民党的情况，另一方面送我们一部油印机以便做宣传工作之用。国民党一个部队派代表来与我们谈判，双方都提出了